

◎汉学一家言

研究海外汉学，促进文化交流

我对国际中国学（汉学）的认识

“汉学”杂谈

十年甘苦寸心知

◎汉学家专页

高罗佩研究

史华罗小传

◎西方早期汉学史

中国（康熙）皇帝的故事（节选）

自然之码——孔子的诗

◎日本当代汉学研究

西学的排斥与接受——近代技术在日

中国的位相

西文化交流史

◎任继愈／主编

蔡元培与法国文化

中国礼仪之争研究概述

利玛窦中国遗址考察初记

◎中国文化在世界

托尔斯泰的晚年和中国古典文化思想

宋程理学在欧洲的传播

◎汉学研究进展

北欧当代中国研究述评

柏林汉学的历史和现状

◎纪念澳门回归

明清之际澳门的外来文化

澳门在东西方关系中的“特区”作用

◎书评与书介

中国：第一个帝国——评《剑桥中国

史》卷一秦代帝国

第

國

五

際

辑

漢

學

International Sinology



大象出版社

K207.8
R488
=5

◎ 任继愈 / 主编

第

國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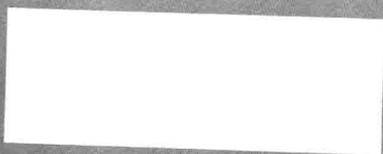
際

輯

漢

學

International Sinology



大象出版社

F047/0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际汉学(5)/任继愈主编.—郑州:大象出版社,
2000.6

ISBN 7-5347-2400-7

I.国… II.任… III.汉学—研究—世界 IV.K20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6828 号

责任编辑:张旭辉

责任校对:郭一凡 范秀娟

书籍设计:张胜

出版:大象出版社

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450002)

发行:大象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0371—5726194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

版次:2000 年 6 月第 1 版

200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8.25

字数:435 千字

印数:1—1800 册

定价:28.60 元

编辑委员会

顾 问：陈乃芳(Chen Naifang) 陈翰生(Chen Hansheng)
季羨林(Ji Xianlin) 饶宗颐(Rao Zongyi)
王元化(Wang Yuanhua) 周一良(Zhou Yiliang)
周常林(Zhou Changlin)

主 编：任继愈(Ren Jiyu)

副主编：张西平(Zhang Xiping)
吴儂深(Wu Junshen)
杨煦生(Yang Xusheng)

编 委：柴剑虹(Chai Jianhong) 陈 来(Chen Lai)
※程裕祯(Cheng Yuzhen) ※高建平(Gao Jianping)
※耿 昇(Geng Sheng) 何其莘(He Qixin)
姜国柱(Jiang Guozhu) 焦树安(Jiao Shu'an)
李明辉(Li Minghui) 李 凭(Li Ping)
李 申(Li Shen) 李慎之(Li Shenzhi)
李学勤(Li Xueqin) 卢海燕(Lu Haiyan)
※孟 华(Meng Hua) 庞 朴(Pang Pu)
※沈卫荣(Sheng Weirong) ※陶秀璠(Tao Xiu'ao)
汤一介(Tang Yijie) ※王 健(Wang Jian)
汪前进(Wang Qianjin) 武维琴(Wu Weiqin)
薛 华(Xue Hua) ※严安生(Yan Ansheng)
严绍澍(Yan Shaotang) ※张德鑫(Zhang Dexin)
卓新平(Zhuo Xinping)
(※为常务编委)

外籍编委：李福清(Boris L. Riftin)
何莫邪(Christoph Harbsmeier)
孟德卫(David E. Mungello)

许理和 (Erik Zürcher)
常志静 (Floria C. Reiter)
杜德桥 (Glen Dudridge)
陈志让 (Jerome Chen)
施舟人 (Kristofer M. Schipper)
谢和耐 (Jacques Gernet)
柳存仁 (Liu Ts'un-yan)
钟鸣旦 (Nicolas Standaert)
罗致德 (Otto Ladstätter)
魏丕信 (Pierre-Étienne Will)
史华罗 (Paolo santangelo)
安乐哲 (Roger T. Ames)
陈荣照 (Tan Eng-Chaw)
罗多弼 (Torbjörn Lodén)
杜维明 (Tu Weiming)
弥维礼 (Wilhelm R. K. Müller)
伊维德 (Wilt L. Idema)

编辑部

主 任：张西平 (Zhang Xiping)

编 辑：李 明 (Li Ming)

马晓冬 (Ma Xiaodong)

吴隽深 (Wu Junshen)

夏 言 (Xia Yan)

来静青 (Lai Jingqing)

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
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学术交流部
主办

《国际汉学》编委会声明

《国际汉学》第1-5辑版权均归大象出版社所有，所刊
载的文章未经授权，不得翻印、转载、转编。

目 录

汉学一家言

- 研究海外汉学,促进文化交流 任继愈(3)
- 我对国际中国学(汉学)的认识 严绍澍(6)
- “汉学”杂谈 高建平(19)
- 十年甘苦寸心知 刘 东(27)

汉学家专页

- 高罗佩研究 [荷兰]伊维德 程 瑛 译(37)
- 史华罗小传 吕滇雯(52)

西方早期汉学史

- 早期西班牙人看福建 廖大珂(61)
- 中国(康熙)皇帝的故事(节选) ... [法]白 晋 杨保筠 译(73)
- 自然之码——孔子的诗
..... [法]巴多明 朱 静 译(90)

日本当代汉学研究

- 北魏的镇人 [日]直江直子 李 凭 译(105)
- 西学的排斥与接受——近代技术在日中两国的位相
..... [日]山田庆儿 康小青 译(138)

中西文化交流史

- 蔡元培与法国文化 沈福伟(175)
朝鲜《国朝五礼仪》与中国古礼 彭 林(189)
中国礼仪之争研究概述 [美]孟德卫 吴莉苇 译(203)
利玛窦中国遗址考察初记 余三乐(217)
利玛窦及其会友在江西 吴孟雪 曾丽雅(233)

中国文化在世界

- 托尔斯泰的晚年和中国古典文化思想 吴泽霖(257)
宋程理学在欧洲的传播
..... [丹麦]K·龙伯格 耿 昇 译(302)

汉学研究进展

- 北欧当代中国研究述评 [丹麦]柏思德 李 明 译(353)
柏林汉学的历史和现状 简 涛(388)

纪念澳门回归

- 明清之际澳门的外来文化 黄鸿钊(443)
澳门在东西方关系中的“特区”作用 黄晓峰(4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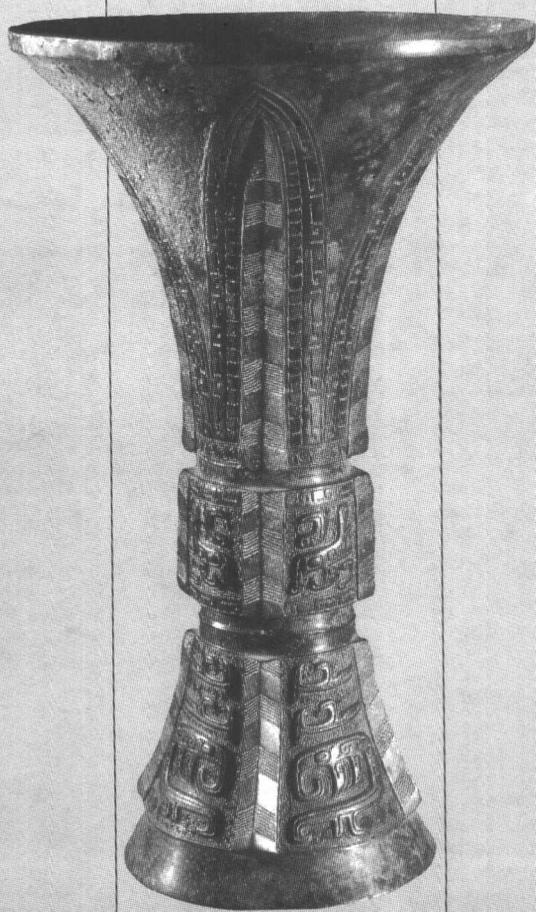
书评与书介

- 中国:第一个帝国——评《剑桥中国史》卷一:秦汉帝国
..... [澳]雷夫·德·克雷斯基尼 胡志宏 译(491)
柯蔚南《东汉音注手册》三礼资料订补 虞万里(502)
《数里乾坤》自序 张德鑫(547)

汉学机构介绍

慕尼黑大学汉学专业简介	张东书 (555)
英文目录	(569)
编后记	(572)

汉学一家言



研究海外汉学,促进文化交流^①

□ 任 继 愈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世界知道中国,不自今日始,回溯历史,中外文化交流共有五次高潮^②。文化交流的深度、广度也是近代超过古代。

中外文化交流,也循着文化交流的规律。一般情况下,文化水平高的一方会影响文化水平低的一方。文化低的一方则比较容易成为接受者。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交流,往往是施与者,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明代中期。其间也有双方文化水平相当,接触后发生冲突,然后各自吸收有用的,并使它为我所用的情况。这种水平相当的交流,往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期,才能收到互相融会、双方受益的效果。进入近代,中国科技领域在国际不再领先,往往

① 本文是任继愈先生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与大象出版社联合组织出版的“国际汉学研究”丛书所写的总序。

② 第一次在汉朝,公元前后1世纪,开通了丝绸之路;第二次在唐朝,公元7—8世纪;第三次在明朝,公元14—15世纪;第四次在清末鸦片战争前后,19世纪;第五次在“五四”前后,20世纪初到现在。

借助外来文化补充自己的不足。明中期,如天文、历算,往往学习西法,这就是中国接受外来文化的又一个实例。

文化交流、交融、吸收、互补,也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只有国力充实、文化发达、科学先进的情况下,才可以从交流中采取主动,吸取其可用者为我所用。当国势衰弱,文化停滞,科学落后时,往往在交流中处于被动局面,甚至失去对外来文化选择的主动权,成为完全被动的接受者。鸦片战争以后,在长达百年的这一段时间里,输入中国的外来文化,有些是我们主动吸收的,也有些是中国所不愿接受的,也有些是被迫引进的。

历史告诉人们,当前世界经济已经一体化,世界上一个地区出现了经济危机,全世界都受震动。文化方面虽然没有达到这样紧密程度,却也有牵一发动全身的趋势。当前文化交流的条件大大超过古代,传递手段之迅捷,古人无法想像。因此,文化交流的责任也远比古代社会沉重。“国际汉学研究”丛书负担着 21 世纪中外文化交流的艰巨任务。

为了全面涵盖古今汉学进展的状况,本丛书分为三个系列:

- 一、西方早期汉学经典译丛(翻译);
- 二、西方当代汉学名著译丛(翻译);
- 三、海外汉学研究(著作)。

“汉学”这一名称,国内外学术界多数人认同,也有少数学者有不同意见。我们不准备用很多精力界定这个名词,我们只是把过去和现代人们已发表的和正在从事研究的这一类译著汇集起来,总之,都属于中国文化这个大范围内的学术著作。正如“新儒家”,这个名字的内容,海内外学术界也有不同的理解和使用标准,因为它属于中国文化这个领域,本丛书也将包括这类译著是同样的道理。

我们愿借这个领域,作为联系海内外研究古今中国文化的桥梁,为人类精神文明略尽绵薄之力,我们的初衷就算达到了。

我们这套丛书,本着对社会负责,对历史负责,对人类未来负责的心愿,向全世界介绍中国文化,同时也向中国展示健康、高品位的世界文化。即将到来的21世纪,是信息爆炸的时代,也是总结历史成果的时代。我们以科学的良心,如实向世界推进文化交流,我们介绍古代先驱者的业绩,在当代人中,沟通各国文化的精华,展望人类未来的光明前景。

只有在健康、光明、理性、科学为主干的文化指引下,人类才可以避免失误,走向和平。每一个经历过世界大战的过来人,深知和平的可贵,战争的罪恶。我们从事文化事业的正直、善良的学者,出版这套丛书,期望其社会效益不限于书斋以内,更寄希望于提高全人类的文化素质,泯除非理性的强权暴行,引导社会走向和平、光明的大道,为中华民族积累精神财富,为世界人民增加友谊与理解。

(作者单位:中国国家图书馆)

我对国际中国学(汉学) 的认识

□ 严绍澍

对中国学术界来说,国际中国学(汉学)正在成为一门引人注目的学术。它意味着我国学术界对中国文化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性意义的认识愈来愈深入;也意味着我国学术界愈来愈多的人士开始意识到,中国的文化作为世界人类的精神财富,对它的研究,事实上具有世界性。——或许可以说,这是 20 年来我国人文科学的学术观念的最重要的转变与最重大的提升的标志之一。

20 多年前,孙越生先生筚路蓝缕,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内主持着一个“中国学研究室”,不定期的出版一份《外国研究中国》的刊物,集合志同道合的朋友,各人从自己能够看到的国外材料中翻译一些“世界对中国的研究”。此刊为小 32 开本,每期容量有 20 万字。这可以说是我国学术界最早期的国际中国学(汉学)的专门性刊物了。与此相呼应,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于 1977 年起也编辑一份

《国外中国古文化研究》，这份出版物就小得可怜了。版面为大16开，每期20页，铅印的封面，打字油印的内瓤，每期容量约为2万字，是从日文和英文刊物上翻译过来的一些学术消息，自编自印，在同行中散发。这份看起来有点像“非法”的印刷物，却为后来北京大学的国际中国学(汉学)作了最早的也是最原始的奠基——因为后来由国家教育委员会认定的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的国际中国学(汉学)研究室，便是从这里发育出来的。1985年又从这里开始，正式招收了我国第一批国际中国学(汉学)硕士学位方向的硕士生(两名)。当时，我的想法是很幼稚的，就是让从事于中国古文化研究的同行，能够大体知道外国人是如何研究中国的。或许这是一个因缘，孙越生先生因此而到北大来找了我。孙先生是我的师辈，从事经济学研究，对国外的中国研究极为注目，立意要为此“做出点事业来”。于是，我们似相见恨晚，经常在一起——有时候在孙先生的办公室里，有时候在孙先生位于东单的家里，共同研讨国外中国学诸事。

我本人接触国际中国学(汉学)，要感谢我的老师——当时任北大副校长兼古典文献专业主任的魏建功教授。1960年9月，当时我是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在我的英文结业之后，魏先生又要我去学习日文。他对我说：“一定要去翻动那些日本人的著作，看看他们做了些什么，不要被他们笑话了我们！”1964年我大学毕业时，魏先生叫我不再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学部读研究生了，要留在北大从事解放前“燕京——哈佛学社”的资料整理。我们当时都是很听话的。但这件事情却很快又因为当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齐燕铭先生以“修正主义分子”之名被解职而告终。但在我还年轻的心中，却是留下了“燕京——哈佛学社”从事汉学的事实，并知道了它的遗留的资料一直被储藏在北大的什么地方。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十余年，我们又都经历了“文革”的沧桑之变，但储存在心头的这个愿望，却总想着待机勃发。“文革”之后，

我觉得我们从事于国际中国学(汉学)的时机,大概来临了吧。

这里我使用的学术的概念是以“中国学”来表述的,这是因为我以为关于对“sinology”所表述的意思,应该有一个历史时间的区分概念,例如把欧美日各国在工业文明建立之前所存在的对中国文化的研究,称为“汉学”,在各国的近代文化确立之后开展的对中国文化的研究,称为“中国学”,或许会更加接近于他们的研究特征的实际。至于说 Chinese Studies,那是另一类的研究,即“现代中国的研究”,它们或许是更接近于社会科学的范畴(例如当代政治、当代经济等等),而不是我们所十分注目的经典的人文学科(例如文学、历史、哲学、宗教、艺术、考古等等)。这是因为在“汉学”的时代,研究者对中国文化不仅是作为“客体”进行研究,而且在不同的层面上还作为“意识形态”来加以吸收(例如在 19 世纪中期之前的日本、16 世纪开始的欧洲传教士一直到 18 世纪欧洲思想革命的时代,其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在主体形态上呈现出“汉学”的特征);而在“中国学”的时代,中国文化是作为世界文化的一个类型而存在,即只是作为研究的客体而存在,与研究者的意识形态并不具有必然的关系(例如在 18 世纪之后的欧洲与 19 世纪中期之后的日本,其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在主体上便呈现出“中国学”的特征)——我国学术界目前在关于 sinology、Chinese Studies 等的译名和关于这一学术的名称认定方面,认识上的差距很大,所以本文在使用“国际中国学”这一名称时,一定要加一个括号(汉学),以示对各学派的尊重。但是,无论是哪一范畴的研究,其研究者在汉语文中则要绝对避免把他们称为“中国通”。因为“汉学家”、“中国学家”是学者的称谓,而“中国通”则是指穿梭于中国市井之间,与社会各色人等厮混相熟,懂得白道黑道,说着流利的中国话的外国人士。例如,像日本的井上红梅等人,人们称他为“中国风俗史家”,实在是非常不妥当的。其实,他只是混迹于当时上海“吃、喝、嫖、赌、戏”五大乐道之中的日本混混,可